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云南地区的对外 交往历史基础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毗邻，边界线长达 3270 公里。其中，中缅边界 1997 公里，中老边界 500 公里，中越边界 710 公里。全省在边境线上的县份有 27 个<sup>①</sup>，具有与邻国陆地相连的对外交往区位优势 and 源远流长的友好交往历史基础。从文物和文献记录来看，早在秦汉之际，云南地区就已与周边各国建立起较为密切的经济交往关系。因而，要想对这个在现代化经济中举世瞩目的中华经济圈与东南亚经济圈连接部的意义有真正深刻和确切的理解，并对它作出合理的战略评估，使它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就首先要对这条纽带的渊源有所了解。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种古代的经济交往并不等同于近代的对外贸易。但是，由于这些情况是云南地区近代对外贸易的历史基础，因而，在正式揭开云南地区近代对外贸易的篇章前，有必要先对这些脉络略作一点追溯回顾。

## 一、充当古代朝贡通道的云南地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古代时期，中国与不同国家之间的朝贡关系，虽带有明显和浓厚的政治色彩，但这种交往在一定的意义上，也不失为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物物交换。只不过由于当时自居于“中央王朝”地位的中国封建统治者往往“薄来而厚往”，并不计较等价，因而人们常常会忽略了这种行为具有的交换本性。当然，这种形式的交换不会很频繁，而且必然地局限于以满足统治者需要的奢侈品为主要内容。但是，由此建立的交往纽带以及道路的开通等意义，却是不可忽略的。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多种多样需求的交换活动，也必然要逐渐展开。这不仅在同一地区、同一国家内部是这样，在不同地区即使是不同国家的沿边地区也是这样。而且交换品种也在发生变化，涉及人民日常生活的用品，日益取代统治阶层间奢侈消费品的互换而占据交换的主体位置。特别是当物物交换发展到向钱物交换过渡时，更表示上述交换已具有向一般性交易活动迈进的条件。所谓具有近代意义的不同国家之间的对外贸易，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古代，云南与周边国家经济交往的最初和最普遍的形式，便是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上述交往关系发展过程的总格局中，建立在亲缘地理、亲缘族情基础上的亲缘经济关系。

云南与祖国西南的周边国家山水相连，高黎贡山循怒江西岸南下，内孕腾冲、龙陵和德宏地区，外沿伸展至缅甸东部。碧罗山（怒山）自北而南至保山道人山后，渐自低扩，向南延伸至缅甸境内。高山峻岭之中，孕育着的江川河流，也沿山脉走势由云南流入周边国家汇入大海。如发源于云南

境内的红河，是越南境内富良江的上源；流经柬埔寨、越南南部，与缅甸、老挝交界的湄公河，其上源是发源于青海，经西藏入云南而南下的澜沧江；发源于西藏的怒江，南入云南贡山县流至滇缅、缅泰交界处又称为萨尔温江；由众水汇合的缅甸伊洛瓦底江，其上游又有由云南境内汇入的恩梅开江、大盈江、槟榔河、盏达河、龙川江和南宛河诸多水系。这种特殊的地理特征，形成云南与周边国家山水相依的亲缘地理态势，并自然构成一个地理区域整体，即九大江河流域的两岸人民共同赖以生存、发展的摇篮。生息在这里的各个民族共同以之为相互流动迁徙、融合、消长和繁衍的交汇地，以及北上南下的共同天然走廊。

这个由亲缘地理构成的广大境域内，居住着众多的民族。在中越边境有傣、克木、苗、瑶、哈尼、拉祜、仡佬等族。在中缅边境有傣、景颇（克钦）、阿昌、傈僳、佤等族。这些民族大多跨境而居，有的在不同的国家内仍保持着相同的称谓，如分布在云南、缅甸、泰国、老挝的苗族，都称为苗族；有的则称谓相异，如傣族，居住在云南的叫傣族，居住在越南、泰国的叫泰族，居住在缅甸的叫掸族，居住在老挝的叫佬族或寮族。这些称谓相异的同源民族，语言近同，生活、服饰和风俗习惯大同小异。

这种同源民族分属不同国度格局的由来，有其比较复杂的原因。不过，总的说来，除了历史上疆域变更的影响外，大多是各民族互相迁徙，又相互结合的结果。例如，据历史考据，在今天的东南亚地区，自远古以来，就有泰族的先民居住的遗迹。公元 1、2 世纪时他们已形成部落组织，其大部落——掸国已出现，并从日南郡和永昌郡到中国通好。到

8世纪时，泰族分成了暹、傣泐、掸、傣那四个部分四个区域。其中的傣那和傣泐族居民继续向永昌、开南地区迁徙，又出现了新的结合。13世纪元在云南设立行省，在泰族区域置车里、八百、老挝、麓川、孟养、木邦等六个宣慰司，孟定和孟良设御夷府。在緬族地区设緬甸、底兀刺二宣慰司。在蒙族区设古刺，底马撒二宣慰司。其后，迭经緬甸、暹罗、越南的一系列历史活动，到进入近代时，景迈归暹罗，老挝属越南，孟良入緬甸，云南保有车里。以上所述是以泰族为例的历史情况，其他民族也大多有过类似经历。

由于这种民族交融的演化史程，使云南与周边地区、周边民族、周边国家的经济交往，具有一种近于“血缘”的族情亲缘关系，并成为历史悠久的长期互补互利，荣枯相依的渊源。由此构筑起来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正是近代云南地区开展对外贸易的深厚历史基础。

在上述民族不断迁徙，互相结合的史程中，周边国家曾在很长时期内处于王朝不断更迭，政区经常变化的状态下。越南是到公元 939 年才立国，緬甸是到公元 1044 年才形成统一国家，老挝则更迟至公元 1353 年才建成独立的国家。由于国力较为单薄，所以，在悠长的前述古代时期中，它们便常有派遣使节，途经云南入中原，向中国各封建王朝求封和朝贡的事。如汉代时掸族部落曾派使臣随哀牢携带土特产由永昌道入贡，得汉封赏，后一次还曾献乐，并带有能吐火、自支解和易牛马头的魔术团演出。唐代时也通过南诏与中原内地联系，如唐德宗贞元十八年（公元 802 年），骠国王雍羌派王太子舒难陀，率领一个有乐工 35 人，乐器 22 种的歌舞团出访中国，在唐都长安受到热烈赞颂。白居易为此

写了《骠国乐》的长诗，描绘了这次演出的盛况。以后，骠国又在 806 年和 862 年两次遣使和唐进行贸易，除了以物易物外，还把骠国银钱带到了内地。9 世纪中叶，骠国灭亡后，蒲甘王朝的开国元勋阿奴律陀曾由八莫入云南求佛牙，受到大理国王的友好接待，赠以碧玉佛。明、清两朝据实录记载，朝贡往来甚密。朝贡往来过程中，充当桥梁作用的云南地区与缅甸也自然建立了纽带关系。至于安南除可另走广西的陆路通道外，还可以由海道进行朝贡且更为便利。所以，其古代途经云南交往的史料较少。

地处内陆的老挝，与中国的官方使节往来，只有通过云南进行。因而其记录要比緬、越为多。这种往来开始甚早，有的史学家甚至远推到起自公元前的越裳朝贡或公元 3 世纪初的堂明朝贡。不过，由于路途的艰辛，这种官方使节的往来到唐代时才较多地正式见于记载。当时的文掸国曾多次带来大象等贡物到唐王朝朝贡。宋元两代的交往记载虽较少，但在有明一代，澜沧国王又先后向中国遣使 30 余次。永乐二年（公元 1404 年）四月，明朝在老挝正式设立军民宣慰司，以刀线歹为宣慰使，颁给印信<sup>②</sup>。明末老挝被缅甸东吁王朝侵占，其后又形成几个小国分裂割据局面。直到雍正年间，老挝国内局势才基本稳定，与中国官方的交往重趋频繁。雍正七年（公元 1729 年）南掌王岛孙派出以叭猛花为首的大型使团，带了两头大象，由云南进入北京朝贡。以后又有多次朝贡，在加强同中国政治联系的同时，经济方面也得到清王朝大量的回赠物<sup>③</sup>。英国历史学家霍尔教授曾针对当时这种回赠物品的价值远远超过进贡物品价值的朝贡交关系，指出其在经济上的意义是：“中国把东南亚使团送来

的礼品记载为贡品，东南亚则认为这些礼物的意义主要是在经济上，而不是在政治上。在早期，这是他们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唯一途径。而中国船只则很少远航南洋，正当的贸易只有通过进贡的使团来进行。此外，当中国送回一些礼物作为对他们的进贡的一种答谢时，这些礼物便成为南洋各国获取巨额利润的一种来源，因为其价值往往超过其贡品。必须提到的是，当时东南亚各国的统治者，就是该国最大的商人。”<sup>④</sup>对云南地区来说，则还有商道的拓展和睦邻的意义。

古代与周边国家经济交往的朝贡这种形式，对云南地区来说，其经济意义显然是无法和后世的近代贸易相比拟和直接联系的。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考察在古代已与朝贡形式同时存在，并在古代已占据着云南地区对外交往主要地位的民间经济交往。具体地说，即对“南丝绸之路”的形成和拓展的意义作一些必要的说明。

## 二、“南丝绸之路”和古代的民间交往

“南丝绸之路”的形成，经历过长期的史程。

东南亚地区与各方的联系，是在黄河流域、金沙江流域、恒河流域的各族先民向那里迁移扩散中建立的。有的学者已由人种渊源上作出考证说：缅甸最早出现的北马族、阿尔干族、孟族等与蒙古族有亲缘关系，而达赖族则含有印度血统<sup>⑤</sup>。有的学者又由文献记录中寻获证据，指出：在公元前 322 年建立的印度孔雀王朝的两部重要著作——《政事论》（也称《实利论》）和《摩奴法典》中，都已有“支那”“丝”的记载。据我国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对《政事论》中“侨屠耶”和“支那帕塔”这两个联在一起的词的含义的解

释是：前一个词指的是一种与丝有关的东西，后一个词的意思，为“支那成捆的丝”。“支那”是“秦”的音译。但也有学者认为梵语 Chin 是 Tsen 或 Sinae 的转音，似应译为滇。<sup>④</sup>“Chin”既是南亚、西亚和西方人最早对中国的称呼，在这里又和丝紧密联系。因而，有必要考察一下中国古代的丝路，是不是秦朝时已有的通路。众所周知，在秦统一六国之前，是春秋战国时期，北方群雄争霸，烽火连年。当时南方的蜀（今成都）远离战火，且以产丝和拥有较高的丝织技术而闻名。由此推论，《政事论》中所述及的“支那成捆的丝”，说它是从蜀地经云南输往缅甸转贩到印度去的可能，显然要比说它可能是由北方去的合理得多，则外人最早时把丝的来源地称“Tsen”或“Sinae”本是指滇的，后来因转为“Chin”（秦）反而使史学家津津乐道于北路，甚至忘了南路，就不足为怪了。

著名的世界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其 1978 年发表的著作中，也对此指出过：公元前 3 世纪时，大夏（今阿富汗）就已经存在着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同印度、伊朗、地中海和红海的商业城市都有着密切的商业往来。经缅甸转贩到印度的蜀丝，很可能由此又辗转贩运到罗马。众所周知，历史上留有公元前 5 世纪凯撒大帝曾身着丝绸盛装出现在王公贵族面前，引起朝野震动的记载。这也是由“南方古丝绸之路”延伸到欧洲的一项佐证。

上述历史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以成都为起点，经由云南、缅甸、印度、阿富汗而达欧洲的“南丝绸之路”，早在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已经在民间悄然存在。张骞不过是正式发现了这条通道而已。

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 122 年），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从大夏（今阿富汗）归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sup>⑦</sup>这种情况使张骞倍感惊奇和欣喜，他断定在汉之西南存在一条中国外通他国的道路。返回后他向汉武帝“盛言”大夏仰慕中国，很愿意与中国交往，但却慑于匈奴的势力，道（北方丝路）阻不通。他认为汉之西南似有一条外通之路，如果能由此道出，则“道便近，有利无害。”<sup>⑧</sup>他的话动摇了汉武帝，“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犛、出苻、出徙邛、出僂，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氏、苻，南方闭嵩、昆明。”<sup>⑨</sup>此外，还另派“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sup>⑩</sup>但是，使臣到了滇国，被滇王滞留。此后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汉武帝先后又派出十余批使团，“皆闭昆明（今洱海地区）莫能通身毒国。”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 年）汉武帝遣将军郭昌、卫广率“三辅罪人”“巴蜀士卒”数万人“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但大兵撤走后，“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通”，再派去的使团，仍被昆明族所阻，“为所杀，夺币财，终莫能通至大夏焉”。4 年之后，滇王附汉，武帝赐滇王王印，汉中央在滇池、洱海地区设益州郡，领 24 县。怒江以东，今保山、大理一带置不韦、嵩唐、比苏、牂榆等县。<sup>⑪</sup>又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两汉之际益州地区爆发了栋蚕等领导的大规模民众起义。起义夷众杀郡守、杀长吏，王莽、刘秀都曾派兵镇压。建武十九年（公元 43 年），刘秀遣武威将军刘尚率兵渡泸水（金沙江），入益州。二十一年初，刘尚军追至不韦（今保山市），

“斩栋蚕帅，凡首虏七千余人，得生口五千八百人，马三千匹，牛羊三万余头，诸夷悉平。”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怒江以西、哀牢山以南的哀牢夷内附，东汉中央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属的不韦、嵩唐、比苏、牂榆、邪龙、云南等6县，合并设置永昌郡。以蜀郡郑纯为永昌太守，管理这一区域的行政事务。至此，“蜀身毒道”打通，并由一条民间商旅往来的道路成为官道，为封建国家和中原人民所知晓。四川所产黄丝、丝绸品由此道源源不断地运往缅甸，转运印度及当时的西亚等地。而这些地方出产的琉璃珠、沉香、珠宝等商品，也由此道大量进入到大理、滇池、四川。一些外国商人也由此进入云南境内居住和经商。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汉明帝十二年（公元69年），永昌郡便住有“闽濮、鸠僚、僰越、裸濮、身毒之民”，并在那里经商。

缅甸学者貌丁昂在其所著《缅甸史》中对上述情况也有相同的论述。他指出，“早在公元前128年，就有了一条通过缅甸北部的陆路。中国的货物就是沿着这条道路经过印度运往西方的。中国皇帝力图控制途经这条道路的中西贸易。公元97年和公元120年，罗马帝国使者两次沿着这条道路前往中国。”<sup>⑩</sup>

具体说来，这条南丝绸之路的途径，是由四川成都出发，经灵关道（因必须经清溪关，故又称清溪道）、五尺道（因经过古僰人居住的地区，又称僰道），进入云南统归永昌道（因要翻越博南山，又称博南道），由德宏入缅甸，再转天竺道入印度。其中的灵关道是由蜀（今成都）出发，经临邛（今邛崃）、严关（今雅安）过大渡河、清溪峡、笮（今

汉源)邛都(今西昌)、盐源、会理渡金沙江到青蛉(今大姚)、大勃弄(今祥云)至牂榆(今大理)。五尺道则由蜀(成都)出发,沿岷江而下至僰道(今宜宾)后转西南,经石门关(今盐津)、朱提(今昭通)、夜郎西北(今威宁一带)、味县(今曲靖)、滇(今晋宁)经威楚(今楚雄)至牂榆。两条线汇合于大理后再转向西南,经龙尾关(下关)至博南(今永平),翻越博南山,横渡澜沧江,到达永昌(今保山)。由永昌南下又分为两支,一支西行经滇越(今腾冲)出境至缅甸金泉城(今密支那)、安西(今孟拱,又称孟拱道),由孟拱西行经阿萨姆入印度,是为天竺道。另一支经茫部(今芒市)、畹町、乐城(今瑞丽)出境到上缅甸腊戍再至下缅甸卑谬(Prome)。据《缅甸史》记载,公元1、2世纪时,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尚未形成,当时卑谬距海不远,由此可出海。

因南丝绸之路连接海洋,大秦人(罗马)在进行海上交往贸易时,除在日南郡登陆外,亦自马达班湾入伊洛瓦底江而上通掸国、永昌郡,故有琉璃、犛虫、蚌珠流入云南。公元8世纪时,云南地方政权南诏王国建立,与骠国(今缅甸)交往密切。据唐人樊绰所著《云南志》(也称《蛮书》)中说:当时,骠国商人经常到大理贸易,云南商人也经常到缅甸贸易。由于双方商业贸易交往频繁,曾使骠国与南诏交界处的悉利移城,成为一个贸易重镇。为了便于贸易,南诏和骠国还各在自己境内设有市场。南诏用于交易的货物主要是丝绸、金、银、刀剑等手工业制品,以及食盐、雄黄、麝香、青木香等土特产品。骠国的货物主要是毛毡、琥珀、玉石、翡翠、江猪、海贝等。

宋时对外部与中国内地的经济交往虽制订有特殊的商业政策，但处于同时期的大理国，为沟通缅印贸易亦作出了贡献，成为宋缅商品交汇的中转地。商人们的经营活动南达萨尔温江的马达班湾址昆仑、弥臣，从那里获得青木香、紫檀香、檀香、槟榔、琉璃、水精、蠹坏等药物和犀牛。

### 三、元明清三代云南地区对外经济交往的增进

由元至清这一段历史时期，是云南地区与周边国家经济交往有较大发展的时期。元代中央政权加强了对边远地区的控制。由于中央政权采取的政策不一，也作用着一个行省的云南地区与周边各国的交往关系各有不同表现。

安南在元、明两朝，朝贡关系依旧，史料记录中陆路仍多由广西而至。至清代据清《文献通考》有如下记载：“由云南至其国，道有二：一由蒙自经莲花滩入程澜洞，循洮江源右岸，过水尾、文盘、镇安、夏华、清波诸州县，凡二十七日至临洮府，又过山围县、兴化府白鹤县，凡十日，渡富良江；一由河阳隘，循洮江源左岸，过平源、福安、宣江、端雄诸府州县，凡二十三日至富良江，然皆山径，欹侧难行。若循洮江右岸入，乃大道也。”<sup>①</sup>对该路所经州府、时间、路况的记载如此详细，可知已历有年所。雍正八年（公元 1730 年）为了方便中越两国人民贸易，开设了开化府的马白关，驻有同知在那里经理。“凡遇商贩出关，一律给予司颁印结，并印烙腰牌，注明年貌、籍贯，照验放行。回日将牌照呈缴，照例收税。迄今征解无异。是内地人民于开化通安南一路，原不禁其出入。”<sup>②</sup>贸易的内容则不论在广西或云南，都是以日用品交换为主的小额贸易。如“太平极处边

徽，……趁圩所市，不过米布帛盐，……他如银、铜、铅、锡、丹砂、翡翠之属，皆出交趾，非此产也。”<sup>⑮</sup>“及调查平而，水口等关出口号簿，不过油豆、零星药材并鞋帽等件，仍供内地在外厂徒服用，并非该国所需，本无实在挟资贸易之人。是以止有带货出口，鲜有置货进口者。”<sup>⑯</sup>

老挝，除有官方使节互往的历史，还有民间贸易的开展。唐代时，原有一条可通过今天的越南义安通往文单城（万象）的道路，全长十六日程。<sup>⑰</sup>在北边有一条青木香山路从今天的西双版纳地区，经老挝到昆仑国。<sup>⑱</sup>到明清时期，中老的交通贸易又有从老挝都城出发经八百、车里到景东者乐甸（今镇源县东北之恩乐）一路，全长十三日程。<sup>⑲</sup>此外，尚有许多小路连接着两国。如由勐腊走猛润隘约一百五十里可以到南掌国的猛温；由乌得（现已属老挝）走整发隘可至南掌补干掌。<sup>⑳</sup>从孟连景线村也有路可通老挝。<sup>㉑</sup>还有一些关隘如乌得的邦董隘、勐腊的拉罕隘、勐丰的埔冈隘、猛泐的泐本隘等，都已可以通行。<sup>㉒</sup>由于有了上述的交通环境，一些特殊的货物便由老挝进入云南。例如云南在明代时还在使用的海贝，有一部分就由老挝输入。“海内贸易，皆用银钱，而滇中独用贝。贝又用小者，产于闽广。近则老挝等海中，不远数千里而捆致之，俗名曰肥。”<sup>㉓</sup>至清代普洱府东界外的老挝人，常入云南内地贸易，云南边地的居民也常入老挝贸易。但因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禁止内地人民出外贸易，例如“乾隆四十四年夏四月，又谕曰：李侍尧奏：据宣慰土司刁士宛禀报，在勐嵩隘口，盘获内地民人陈文清等五人，自南掌地方，携带象牙、犀角、鹿茸、孔雀尾等货，连人一并解究……。”<sup>㉔</sup>这种政策自然对贸易的正常开展有很大的

碍。不过，这些史料记载也同样表明，在山水相连的中老两国，人民之间的贸易往来实际上是割不断的。

老挝、越南两国与云南的经济交往，伴随历史的演进虽也有发展，但远逊于缅甸和云南地区的交往。

元代，云南与缅甸的经济交往关系，在“南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又开拓出多种经济交往形式。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九年（公元 1272 年）曾遣使臣向缅甸征贡。至元十九年（公元 1282 年）设置了“金齿”和“邦牙”宣慰司。同时还派人着力恢复商道，在沿途设立驿站。元成宗大德四年（公元 1300 年）缅甸内乱，元朝曾数次派兵入缅，战后有不少士兵流落缅甸。此后，元政府又在德宏边境实行军商屯政政策，中缅边境的贸易随之发展。据《马可波罗行纪》和《百夷传》的记载，都提到交换形式逐步由以牛马等家畜为等价物的物物交换，发展为以使用海贝和金银为媒介的货币交换。元代云南对缅甸的出口货，以丝绸、金银为主，缅甸进口的商品则主要是象牙、犀角、翡翠、光珠、海贝、玉石。其中以玉石的增加较为明显。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因 13 世纪时，缅甸从中国聘去大批开采玉石的工匠，他们带去的采玉技术，替代了当地土法开采。据史料记载：当时因云南人在缅北地区直接从事玉石开采，使其产量一年内达千担左右。除此之外，著名的云南马也大量经缅甸运至印度出售，从而使元代成为滇缅经济交往繁盛的时代。

另据对缅甸侨史研究有年的华侨作家黄绰卿先生考证说：“华侨自陆路移殖缅甸而定居下来，当系自元代开始。元代居住缅甸已有汉人和来自中国的维吾尔族和回族。”<sup>⑤</sup>

明王朝取代元王朝后，缅甸也进入以阿瓦（今曼德勒附近）为首都的上缅甸国时期。明太祖洪武十八年（公元 1385 年），平缅宣慰使恩伦叛变，明兵入缅平叛。1394 年明朝置六宣慰司，即木邦、缅甸、车里、老挝、八百大甸、勐养，在阿瓦置缅中宣慰司，封缅甸王卜刺浪为宣慰使。后又增设四司，即陇川、孟密、蛮暮、干崖，加强明中央对边远地区的控制。嘉靖年间，缅甸再次变乱，至 1447 年阿瓦缅王承认中国为宗主国，明代宗封之为阿瓦宣慰使，赐冠带和金印，并警告中缅边道上的掸族土司，不许阻碍滇缅商道的正常通行。为了保证中缅贸易正常进行，明军于 1520 年将驻兵基地移到怒江以西的腾越。

明代，滇缅经济交往已经非常频繁，即使在战火频频的硝烟中，仍有商人冒着生命危险，往来于滇缅两地和经由缅甸进入东南亚贸易。正统九年（公元 1444 年）时王骥就针对这种情况说过：“近边牟利之徒，私载军器诸物，潜入木邦（今缅甸掸邦北部）、缅甸（以今阿瓦为中心的伊洛瓦底江中游地区）、车里（今西双版纳）、八百（今泰国清迈一带）老挝诸处 结交土官人等 以易有无。”

此外，因为明朝数度派兵征缅，有不少士兵流落缅甸，特别是明末桂王逃往缅甸时，随从到缅者也有千余人，散驻于沙洲（今实阶）。后明将白文选、李定国遣兵 20 余万，赴缅迎接桂王，入缅后据守孟乃（或称孟良，即今景栋附近），遭缅兵阻击，也有部分散落缅甸乡间。这些流散的明兵与当地民族通婚，形成桂家（或称贵家）又称敏家势力。这批移民的遗裔中著名的有茂隆银厂的吴尚贤和波龙银矿（中国人称为“大山厂”或“老银厂”）的宫里雁，雇佣工人“常

不下千万人。”随着侨居缅甸华人的不断增加，滇缅经济交往不断扩大。往来于滇缅商道上，从事经商、开矿、务农的华人络绎不绝。“明代华商曾经从陆路输入白盐接济食盐缺乏的缅北。开采孟密的宝井（摩谷红宝石矿）是明万历三十年（公元 1602 年）开始的。缅产棉花在明代开始输入中国。当时华侨居住八莫已有数万人。……这些陆路来缅的华侨已有福建、广东人了。到了明末清初，华侨在缅北瓦邦和南渡开采银矿，两地的矿工各达数万人。在景栋、八莫和密支那等地都有华侨商旅往来。”<sup>②</sup>据朱孟震的《西南夷风土记》记载也说：隆庆年间“江头城外（今八莫）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

明朝时期缅甸出口到中国的主要货物是宝石。宝石价格昂贵，贩之可获厚利，很多中国商人便前往缅甸开采宝石矿井和经营宝石贸易。据谢肇淛撰《滇略》中《永昌府名产》和《风俗》条记载：云南商人从数千里以外的孟密、勐养等地把紫英、云母、水晶、绿玉、古喇锦、西洋布、孩儿茶等贩到云南，销路非常好，“辐辏转贩，不径而走四方。”当时云南在缅甸经营宝石的商家已达一百多家，开采宝石年产量约千万担左右。明王朝还派出太监在云南专门负责从事缅甸珍奇商品的采购、玉石的加工上贡。云南的腾越自此成为缅甸玉石加工外销的重地。中国销往缅甸的商品，仍以丝绸、生丝为大宗。丝绸不仅是缅甸各阶层人士的重要衣料，缅甸国王更经常把它作为外交礼物转赠给外国。加之随着入缅华人逐渐把织绸技术传播开来，促进了缅甸丝织业的发展，更使输缅的生丝增加，最多时曾达一年 2 万担。此外，一些关系人民生活的日用品交易也日趋增加。例如铜铁打制的剪

刀、针锥、铜锣、铁锅等手工产品，民间手工制作的土布、纸、毡、土碗、麻线、爆竹、斗笠、滇茶、核桃等土特产品，都成为滇缅商人经营的商品项目。在与云南接壤的缅北地区，还出现了日趋繁盛的以缅棉交换滇盐的贸易。为了便于管理，明初在昆明设“緬学馆”专门负责对外经济交往事务和接待缅甸来使与客商。至明永乐三年（公元 1405 年），又增设云南“市舶提举司”。

由于滇缅贸易的发展，边境地区还陆续出现了一些贸易中心和货物集散地。如前引的《西南夷风土记》中说：“蛮莫等处，乃水陆会通之地，夷方日用咸自此出，货利之盛，非他方比。”缅甸所需要的茶、盐、毛纓等，都先由云南运至蛮莫，再“由蛮莫而后入也”。据《云南志略》记载：当时边民交换的市场，大约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较为普遍的农村集市，或五日一集，或十日一集，交换的货物主要是傣族人民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如茶、盐、布等。另一种则是较大的商业集镇，如前所述及的江头镇，盛产宝石的孟密等地，已出现“一日一小市，五日一大市”，“估客云集”“商贾辐辏”的景象。

清初，派兵入缅迫交永历帝，自此直到乾隆三十年（公元 1765 年）以前，中缅边境平静，贸易交往正常。1765 年以后，雍籍牙王朝在中缅边境内战，并由此屡犯中国边境，清王朝多次派兵平息。1769 年 12 月，缅方请和，清缅双方在八莫城南伊洛瓦底江边的恭屯缔结和约，规定停止战争，清军撤出缅甸，恢复贸易，缅甸向中国遣使纳贡。后又在签约的一些具体问题处理上出现麻烦，缅方背约不贡，清政府遂关闭了中缅贸易税口，禁止两国商人来往贸易。乾隆四十

一年（公元 1776 年）缅甸内乱，同时受暹罗复国威胁，在内外压力之下，缅甸由木邦备金叶表文、金塔 1 座、驯象 8 头、宝石番毯诸物入贡中国。1789 年缅王孟古又遣使入贡，乾隆皇帝册封他为缅甸国王。1791 年缅甸趁庆祝乾隆八旬寿诞之机，再次请求开放两国贸易获准，自此恢复友好往来直至缅甸被英国占领时。

清代，是滇缅经济交往最繁盛的时期。首先，由于清缅战争，滞留和迁移入缅的华人增多，他们在缅甸的经济活动影响也逐渐增大。有许多文献都说：1755 年当雍籍牙将孟族赶出“大光”，将该城改名为“仰光”时，聚居于该地唐人坡一带的中国船户已相当多。他们在江岸自建起一个码头，被称为“中国码头”。到 1790 年时，华侨居留缅甸者已有 6 万人。西姆斯在其 1795 年的使缅日记中，曾多次提到上缅甸有“德由谬”（即中国城）。此外，在上缅甸居住有众多华人的阿瓦、阿摩罗补罗、八莫、蛮莫、孟拱等地区，都有“汉人街”、“关帝庙”、“观音寺”、“云南会馆”等等，从事着商业活动和其他经营活动。又据史载：上缅甸的宝石矿、银矿的开采，主要是由华侨在经办。阿瓦以北七十英里的伊洛瓦底江流域的商业，也主要是华侨在经营。

由于滇缅贸易有了进一步发展，陆路边关有可观的收入。中缅双方都在边境上设置关卡，征收过境税。据汉内上尉 1835 年记述，中国商队在八莫向缅甸政府缴纳的过境税是：马一驮 18 卢比，驴一驮 12 卢比，牛一驮 13 卢比。贸易的繁盛使缅方在抽收税款上获利匪浅。敏同王在位期间，每年可由此征税 500 万克亚特（Kyet）折合英镑 50 万镑，是同期英国港口格拉斯哥与下缅甸贸易总额的 1/16，是